

列宁道路

LENIN

2021年·9月刊

声明

佳士抗争进行了知识分子走向工人阶级的尝试，其失败严肃地提出了走向工人阶级的道路问题。鉴于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泛左翼中小资产阶级思潮泛滥等方面均与列宁进行斗争的环境高度相似，我们认为在马列毛主义中突出列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通过精读《列宁全集》，掌握在新兴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建立先锋党来组织工人团体去推翻专制政府的科学体系，自觉清理头脑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其方法论的残余，才能形成具有共同理论基础的革命家队伍，从而减少未来在思想、政治、组织和策略等问题上分裂的可能。同志们，干起来吧！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还有很多任务等待着中国无产阶级中觉悟的革命者，而首要的就是根据列宁同志的先进经验和中俄现实情况的共通之处，在共同阅读全集的基础上，创办编辑部设在海外的全国秘密报纸，走向工人团体，而后把散布在中国各个地方的革命团体统一成为一个革命的工人政党！

本刊物第一期为星火出版社以读者身份排版，“列宁道路”在此表示衷心感谢。计划自第二期起由“列宁道路”频道编辑出版，并沿用星火第一期的封面（因暂时未与星火出版社取得联系，后续贵社若有任何意见欢迎随时向我们反馈）。也欢迎同志们为本刊撰稿、写通讯以及提供意见与建议。

2021 年 9 月 30 日

目录

佳士抗争的正确路线和错误策略 1

为什么需要明确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界限？ 6

论组建新的工人政党 13

简评郑州外国自由派记者遭围攻 18

脑力劳动者是无产阶级吗？ 18

装点门面的左派的合唱与工人运动的危机..... 20

中特提出“共同富裕”的口号意在何处？ 24

拿着马列毛主义的武器走进现实——答羊肚对佳士抗争的分析 26

评孟晚舟回国 30

列宁道路的内涵和现实意义..... 32

佳士抗争的正确路线和错误策略

傅义武

佳士抗争失败已经快三年了。正如历史上的一切革命尝试一样，不同社会集团用不同的态度对待这一历史，从而维护自己的利益：专制政府闭口不提，期待用沉默来让群众忘记革命，同时尽一切力量防范历史重演的苗头；自由派社会学家们用“中立”“学术”的语言回顾这段历史，说它指导思想是“意识形态”，组织方式是“高压”，抗争方式“非法”“太激进”，无非是希望未来必将爆发的群众运动能在自由派的“理论”下，无中心地“组织起来”，进行合法改良，从而为专制制度维持统治尽绵薄之力；马克思主义者回忆这段历史，郑重地纪念它，则是为了用革命历史教育自己和群众，在未来推翻专制政府，消灭资本主义的行动中吸取它的经验教训，让重建社会主义的道路更笔直一些。

佳士抗争的正确方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也是最基本的方面，表现在它是有意识地、自觉地社会主义斗争。不管运动的发起者抱有怎样的目的，运动的一线参与者大多数都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对改开后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认识很清晰，无产阶级立场也确定不移。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错了吗？没有错。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对工人阶级状况的起码了解都告诉我们他们没有错。否认这一点，说什么特色社会主义，改开前后两个时期互不否定等等，是对常识无耻的嘲弄，是为自己脱离革命阵营进行的苍白辩解，是帮助专制政府涂脂抹粉。只要承认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和中国工人阶级的雇佣奴隶地位，就必须在改良还是革命中作出选择。绝大多数的佳士运动的参与者，选择了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并且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在选择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意义，佳士抗争的方向与俄国十月革命、中国的上一轮革命一致，是同样不朽的，因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会将这样的斗士和这样的选择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不能用佳士抗争的策略错误导致的失败去否定其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方向。正如不能像普列汉诺夫那样因为 1905 年 12 月莫斯科武装起义失败而说“本来就不应该拿起武器”一样，每一个想获得分析

佳士抗争方向是否正确的能力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去读一读列宁写的《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见《列宁选集》第一卷）。在这篇文章里，列宁借鉴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种种错误，却肯定其正确方向的革命传统，在分析了莫斯科武装起义的诸多缺点后，肯定了俄国革命者冲天的斗争精神。列宁写道：“马克思能够理解到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即群众进行殊死的斗争甚至是为了一件没有胜利希望的事业，但对于进一步教育这些群众，对于训练这些群众去作下一次斗争却是必需的。”马克思和列宁所能理解的，专制政府的御用文人理解不了，自由派的“社会学家”理解不了，我们却要加以理解。佳士抗争的失败，不能和巴黎公社的失败、莫斯科起义的失败相比拟，因为广度、深度和阶段相差太多，然而我们对它们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就其积极意义而言）是一贯的。

佳士抗争正确方向的第二个方面，表现在其集中制的组织方式。这个方面和第一个方面具有同样的真理性，但由于受到专制政府反面榜样作用和自由派不遗余力进行灌输的影响，思想混乱较之第一个方面严重地多。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理论整体，各个部分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其中某个部分只有与其它部分共同发挥作用才能保证共同的效果。中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关于中国当前是社会主义的结论没有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可是其用“中国化”做掩盖，任意肢解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方法论却被广泛接受。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觉得也可以轻松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以适应中国革命的需要，却无意中脱离了整体性，将无理论修养的状态当作一种可以接受的现实——反正以后会“中国化”掉的。这反映了一种统治集团瓦解革命运动的意识形态机制。要瓦解这种瓦解机制，非精通列宁的著作不可，因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整体性做了比马克思、毛泽东更系统，更通俗的阐释。具体回到集中制问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群众的觉悟。但群众受到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影响，处于身受剥削，心予认可的矛盾状态。对抗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统治，就需要建立党的意识形态机器，用科学的意识形态取代虚假的意识形态。工人从自己的生活条件出发，容易接受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而拒绝假马克思主义，开展自觉斗争。专制政府这时必须动用暴力国家机器，无产阶级这边则暴力反抗，这就需要党在教育

外还进行组织和领导。统治集团的国家机器高度组织化、集中化，如果无产阶级的党不如此，就不可能战而胜之；前面讲的第一个方面，即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便只能是一句空话。俄国革命中，孟什维克开始要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还和列宁一起反对经济派工联主义，主张对工人进行原则坚定的社会主义教育；但孟什维克不接受这些工作需要一个组织上集中、巩固的党。列宁捍卫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结论，写了一本名为《进一步，退两步》的著作分析与孟什维克在组织观点上分歧的始末。在这本著作的结尾，列宁写道：“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列宁选集》第一卷）佳士抗争坚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方向后，还坚持了上述组织方向，这也是佳士抗争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成就不大且最终失败，却仍成为改开以来最强有力的社会主义斗争的原因之一。今后的斗争，如果不坚持集中制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第一组织原则，那么会连佳士抗争的高度都达不到。

佳士抗争的第三个方向，是其进行了走向工人的尝试。在战场上击败专制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只能是觉悟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在运动的初始阶段需要知识分子集团的帮助。佳士抗争正表现了这样的尝试，甚至一些具体选择上都对今后的工作有启发意义。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发达的两个地区是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集中了数以亿计的工人。其它地区还需要用“扶贫攻坚”建立起来的状况，在这两个地区已经由历史现成地提供出来了。佳士抗争选择在深圳这个珠三角的中心发动，而不是像北京这种社会主义思想活跃的中心发动，是经过考虑的结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将自觉的社会主义理论运动和自发的工人运动结合成为统一的、强大的革命力量的愿望。尝试的结果与愿望差距极大，但尝试的方向与愿望的方向是一致的。在此意义上，佳士抗争在中国的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历史上区分了两个时代：在佳士抗争之前，社会主义只是脱离工人的一种理论运动；在此之后，社会主义理论不走向工人，就不敢自称为社会主义了。值得指出的是，要是在今天仍然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局限在象牙塔里，认为主要的目的仍然是培养和教育学生，那就是无视佳士抗争尝试的里程碑意义，试图维持社会主义理论与

工人运动隔绝状态的尾巴主义。

明确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走用革命方式重建社会的道路，为了这一目的建立集中的组织并尝试走向无产阶级群众，这是佳士抗争的正确方向。佳士抗争失败了，但这是反映了上述正确方向的失败，不能因为它失败了就否定这些正确方向，转投到专制政府和自由派的阵营中去。不坚持这些正确方向，就谈不到去总结佳士抗争的策略错误。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佳士抗争的策略错误有哪些方面。

佳士抗争最突出的策略错误，是其政治冒险主义。历史上与之最接近的派别，是俄国革命中的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看到了群众的不觉悟，意识到了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任务，但他们认为教育群众的素材不在群众的生活之中，而在群众的生活之外。需要他们进行政治冒险，例如刺杀沙皇的恐怖行动，去激励群众的斗争。列宁尖锐批判了社会革命党人，指出他们将宝贵的觉悟人员用来政治冒险，浪费了本应用于向工人进行日常的、平凡的政治教育的力量，维持了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的隔绝状态，因此是和经济派修正主义一样崇拜自发性的派别。佳士抗争希望改变政治生活一潭死水的局面，于是将觉悟力量投入一次虽然喧嚣一时，但显然毫无希望的冒险，以此激荡社会的情绪，本质上和社会革命党的政治冒险主义是一样的。实际上，在群众没有革命情绪的和平时期，需要建立政党，出版秘密政治书刊，对群众进行似乎没有任何直接效果的宣传、鼓动工作，甚至在条件最恶劣的时候也必须如此。这时言语即行动；在群众面临危机，表现出改天换地的革命情绪的时候，需要毫不犹豫地领导群众运动，将之推进到更高的阶段，这时行动本身将起到最大的教育意义，行动即言语。佳士抗争试图在群众没有革命情绪时用政治事件去创造这种情绪，结果自然是双重的失败：在知识分子这边，觉悟力量损失殆尽；在群众这边，其阶级意识未见提高；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方向，只进行了尝试，并未取得成效。当时和今后正确的策略是什么呢？答案是集中已有觉悟力量，在海外出版政治报纸，在国内建立传播网络，在各省，特别是资本主义最发达地区的大工厂里进行原则坚定的社会主义教育，并在取得一定进展后建立秘密工人政党。耐人寻味的是，佳士的参与者，特别是领导者，是比较熟悉列宁的名著《怎么办？》

的。此书正文共分五章，前四章讲要建立组织上巩固的党，引起了佳士抗争领导者的极大关注；第五章讲这个集中制的党要在全俄政治报计划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并继续推进全俄政治报计划，却未引起佳士抗争领导者的任何注意。这可能与他们缺乏理论修养，没有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认为一些部分可以“中国化”有关。

佳士抗争的第二个策略错误，是其运用集中制原则时没有配合民主讨论。列宁在《怎么办？》里批评了民主原则，这可能构成了佳士抗争运用单一集中制原则的一个原因。这样一来，组织内反对政治冒险主义的声音就不能在那时影响运动的方向。这需要对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有一完整的认识。首先，需要明确集中制是第一组织原则，即使集中制的结果不佳也不能否定这一点；而民主制是第二组织原则，讨论自由不能影响决定做出后的行动一致。其次，集中制原则始终起作用，民主制原则在组织发展起来后起作用。在组织发展起来之前，工人受到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没有完整的社会主义世界观，而知识分子具备这种世界观。不能用“民主”的借口妨碍知识分子向群众灌输这种世界观。这也是列宁在《怎么办？》中反对民主制的原因。在组织具有了社会主义意识相当明确的基础之后，领导层的修正主义倾向会随着运动的发展而逐渐增强，原因是知识分子集团的生活条件脱离革命，而群众，尤其是觉悟的工人群众，由于其生活条件而能够彻底革命。这时必须用民主集中制的方式，让群众去选择领导层中的革命集团，与来自各方面的修正和动摇倾向进行斗争。佳士抗争的过程表明，其领导层斗争的彻底性不及一线参与者，但正是这些坚定的一线参与者没有决策权。坚持集中制原则，并在基层觉悟的条件下实行讨论自由、行动一致的民主程序，防止（虽不可能完全杜绝）修正主义的改良和无谓的冒险，是佳士抗争留给我们的第二个教训。

坚持佳士抗争的正确方向，改正其策略错误，在几年的时间内通过阅读《列宁全集》达到思想统一，准备出版全国政治报的计划，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佳士抗争的正确态度。让专制政府和自由派叹息我们的执迷不悟吧，我们会用佳士抗争中表现出来的无畏精神，创造出他们不愿看到的历史。

为什么需要明确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界限？

杜烈凝

复旦教师姜文华手刃党委书记事件，卡车司机金德强服毒自尽事件，突出地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状况的急剧恶化。在左翼的讨论中，出现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不应把他们归入小资产阶级，而应将之看作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这一分歧，对于当前的迫切任务，即通过阅读《列宁全集》从泛左翼中把马克思主义的队伍创建起来，为出版全国秘密政治报纸做准备，并没有直接的影响。只是由于造成这一分歧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一定会对政治报计划之后的道路选择产生作用，所以我们应对之表示比较完整的看法。我们先说这一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解释，再讲界限划分对于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最后讨论分歧背后的思想方法原因。

将姜文华看作无产阶级成员的主要依据，是他没有生产资料，受雇于复旦大学并领取工资，而且面临被解雇的风险。这和富士康工厂的工人似乎没有明显的形式区别，但实质的差别仍然存在：高校的学者是服务与收入相交换的非生产劳动者，工厂工人是劳动力与可变资本相交换的生产劳动者，前者（学者）以后者（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为生。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性目的，不理解剩余价值的来源就不能理解资本主义，更谈不上理解如何埋葬资本主义。可是不理解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别，就不能理解生产资本的劳动是剩余价值唯一的来源。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以简单再生产为前提来分析，即假设资本家把自己获得的剩余价值消费掉。这名资本家预付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c+v$)，生产结束后收回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外，还获得剩余价值($c+v+m$)。被资本家雇佣的工人不仅再生产出工资，而且还以工作日中的无酬劳动，为资本家生产出剩余价值(m)。这就是资本主义利润的秘密，而提供剩余价值的工人因此是生产劳动者。按照我们的前提，全部剩余价值都构成资本家的消费基金，而不进入积累。我们进一步假定，这个资本家用剩余价值的一部分，雇了一个保姆，从而让自己不仅在生产过程中是资本家的角色，而且在生产过程之外也过上资本家的生活。这个保姆和生产剩余价值的工人形式上看

起来是一样的：都没有生产资料，都从雇主那里领取工资作为自己的生活来源，都可以随时被解雇。可是二者在剩余价值的创造方面，从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义完全不同：资本家把工资付给保姆，当保姆的服务结束时，资本家不能收回自己付出的等价物了；这是最简单的商品交换，和资本家为自己买一辆豪车从而以另外一种方式消费剩余价值没有区别；工厂工人既生产出工资，又生产出提供给资本家（在较大程度上）和保姆（在较小程度上）消费掉的剩余价值。劳动与收入相交换的保姆是非生产劳动者，不创造财富反而消耗财富，因此亚当·斯密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立场出发认为这样的劳动者越少越好。劳动力与可变资本相交换的工厂工人是生产劳动者，他们的劳动不仅养活了他们自己，不仅养活了全社会，而且提供了资本得以积累，生产得以发展的价值源泉。

产业资本家不能独享剩余价值，必须按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原则与商业资本家和货币资本家分割剩余价值。货币资本家的雇员们，例如蚂蚁金服里的职员，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劳动者，因为整个金融业都不创造价值，更不可能创造剩余价值。参与掠夺的不只有资本家，还有地主和官僚。地主凭借土地所有权要求获得地租，这是剩余价值的又一表现形式。官僚们提供秩序（实际上是强加），要求收税作为财政收入，于是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财政拨款是复旦大学数学学院的资金来源，因而也是这个手刃党委书记的教师姜文华的收入来源。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是劳动与收入相交换的非生产劳动者，不是劳动力与物质生产部门的可变资本相交换的生产劳动者。就其消费而非生产剩余价值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和资本家的保姆没有区别。

资本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劳动力商品与可变资本相交换，使货币转化为科学意义上的资本的同时，也使劳动者转化为科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者，即无产者。非生产劳动者即使在形式上也是货币与商品交换，但由于这里的商品不是劳动力，而是服务，因此不能产生剩余价值，于是既不能让货币转化成资本，也不能让劳动者成为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无产者。无产只是成为无产者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不占有生产资料之外，还要进行雇佣劳动并且创造剩余价值才能称为工人

阶级。要不然依靠国家救济的流浪汉就比工业无产阶级更像工人阶级了。实际上依靠国家救济的流浪汉，和达官显贵们一样，都寄生在工人阶级创造的那个价值余额上。工人阶级的范围需要从不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集团缩小到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者集团，小资产阶级的范围则需要相应地扩大，即从占有自己生产资料的劳动者集团，扩大到不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者集团。占有自己劳动的生产资料只是成为小资产阶级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因为必须把非生产劳动者包括进来。工人阶级生产剩余价值，资产者无偿占有剩余价值，劳动但不生产剩余价值的是小资产阶级。马克思对家仆的阶级属性有明确的看法，指出其为小资产阶级提供了最为卑贱的分子（《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六卷第一分册第 198 页）。马克思还指出学者、学士、教士等在经济学上与仆从地位一样（同上第 314 页）。马克思的这些论断，是其剩余价值理论的逻辑结论。如果推翻这些论断，那么就必须设法模糊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别，就必须在承认学者劳动的生产性之后，也承认贵族和妓女是生产者，并从根本上动摇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庸俗经济学家们的这种辩护企图，马克思给予了公正的揭露，指出为非生产劳动者中寄生部分恢复地位的意识形态企图，本身就宣告了这些学者是依附于资本家的。我们还可以看看马克思有哪些进一步的结论，以及这些结论在现实中如何表现。资本积累的历史进程，将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绝对增加并相对减少生产劳动者。资本家掌握较大的剩余价值之后，生产过剩一方面减少了投资机会，另一方面营造出奢侈的消费风气，这都导致了非生产劳动类型的雇佣化小资产阶级的增加。用较少的生产者养活较多的非生产者，这是生产发展的另一种表述。马克思引用材料说明，1860 年代英国工厂工人数量就大幅少于女仆的数量（同上第 197 页）。这类雇佣化小资产阶级的工资，也由类似决定劳动力商品价格的规律来调节，即由其再生产所需的商品价值总和来决定，并受竞争的影响。其人数的增加，教育程度的提高，将激化其竞争，使其报酬下降。今日中国的现实，也证明了马克思这些结论的科学性。

卡车司机属于经典意义上占有自己劳动资料的小私有者，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鉴于读者一般较为了解，就简略一些，只是指出几个要点。首先，其发展的趋向是

分化为拥有多辆卡车，雇佣别人开的少数资产阶级，以及失去自己卡车，专为别人开车的多数雇佣劳动者。在有大量资本进入这一领域的情况下，这种分化会更快，沦为雇佣劳动者的比重会更高。其次，小资产者受到大资本的压榨，卡车司机往往资金不足，需向货币所有者借贷，因此受到借贷资本的盘剥。卡车司机日益依赖于掌握销售运输服务渠道的互联网资本，需要支付服务费，因此又被互联网公司剥下一层皮。来自大资本的压榨，会加速其分化。再次，小资产者会极力抗拒自己跌落到无产阶级的命运，拼命多干活少休息，其生活水准甚至低于工厂工人。这一点和列宁描绘的俄国小农并无区别，都不会因为其贫困而应划入工人阶级的范围。最后，拥有卡车的司机的阶级属性不同于拥有电动车的快递员。快递行业和运输行业一样，不提供独立于生产过程的物质产品，但其产生的位置移动是使用价值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属于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物质生产部门。快递员的劳动力与这一物质生产部门的可变资本相交换，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至于是计件工资，电动车是自己的，并不影响这一实质。快递员不会因为拥有几辆电动车而成为资产者剥削其他快递员，而卡车司机就可以因为拥有几辆卡车而上升为资产阶级。

严格的阶级划分不仅具有经济学上的理论意义，它还是推翻专制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唯一道路，即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各个阶级的经济社会地位，决定着他们的政治态度，也是我们观察各个政治派别（目前是舆论派别，即政治派别的萌芽形式）的出发点。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根据马克思主义，即唯一的社会科学，确信只有领导推翻专制政府的民主统一战线，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才能走向社会主义。代表一小撮权贵和大资本的专制政府则拒绝在没有群众运动威胁的情况下进行任何重大的改良。资产阶级自由派希望与专制政府分享政权，又担心革命方式走向冲击私有制的结果，要求自由主义式的改良。小资产阶级的经济社会地位处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其要求也是如此：往往有比自由主义更激进的民主主义要求，但又达不到社会主义，即要求对小资产阶级比较友好的资本主义；争取民主主义要求的方式也动摇于革命与改良之间。目前专制政府的政治面貌最为清晰，对自身的利益最了解，也组织得最好。其余三个主要社会集团的政治面貌还很模糊，尚无重大的

危机去让他们充分表现自己。但只要阶级斗争明朗化，经过一段不长的时间，就会发现各社会集团的政治力量与其经济基础的一致性。无产阶级必须同时开展三个方面的斗争，才能赢得社会主义：清理队伍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自由派争夺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向专制政府发动进攻。清理队伍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争取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策略上的一致，将是这条道路的起点。

是不是自始至终都坚持阶级界限的严格性，对于工人阶级而言是一个事关成败的重要原则。放松这种严格性，在想像中扩大了阶级基础和阶级队伍，但却不再能保持思想理论上的彻底科学性，不再能用原则坚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真正的工人阶级有力地走向政治斗争。唯一实际的路线就是原则坚定的路线。将小资产阶级拉进无产阶级队伍的路线，既放弃了原则，也不实际，因为小资产阶级受资产阶级影响由其经济社会地位决定，并非宣布一下就能消除。明确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界限，在民主革命阶段领导小资产阶级用革命手段实现彻底民主主义的要求，才是既有原则，又符合实际的科学道路。

列宁和毛泽东，都像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是坚持界限严格性的模范。列宁在科学社会主义在俄国尚是一种左翼中的非主流思潮时（和今天中国非常相似）即坚持这种理论的严格性。列宁写道：“社会民主党人当然不能同这个政党（即小资产阶级政党——引者注）‘统一’，因为他们认为工人必须独立地组织成一个单独的工人政党，但是工人对民主主义者反对反动机构的一切斗争，都会极力给以支持。（《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一卷第 257 页）。在列宁写下这句话的 1895 年，无论是无产阶级的党，还是小资产阶级的党，都还处在思潮传播的萌芽状态。这种界限是否需要坚持，是 1903 年俄国党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深层原因。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以《火星报》为主要阵地战胜了经济派修正主义者，在对工人进行全面政治教育而非领导单纯经济斗争这个原则问题上有了一致意见。但全面政治教育需要组织上集中的党。孟什维克为了让自由散漫成性、不能接受严格纪律性的知识分子入党，提出了党员不必加入支部即可自称党员的党章第 1 条。列宁与之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没有这一斗争，就没有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的胜利将难以

想象。

毛泽东在坚持阶级界限严格性这一点上同样坚定不移。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写道：“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年版第641页）。1956年8月，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上说：“我们党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一千多万党员里头，大中小知识分子大概占一百万……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合适。”（《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版第302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小资产阶级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正如他们在革命中时常由于两面本性倒向资产阶级一边一样。因此毛泽东有时也将知识分子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周恩来、聂荣臻、陶铸等人则希望把知识分子划入无产阶级的范围。据薄一波回忆，在周恩来当面要求毛泽东就知识分子问题表态时，毛泽东没有说话。在另一个场合谈及此问题时，毛泽东公开表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阴魂未散，有些阳魂也没有过来。”（《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993年版第1006页）可见是否坚持阶级界限构成了建国后党内阶级斗争的一个侧面。1978年3月，邓小平声称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94年版第67页）这也成为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在明确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界限的问题上，我们必须走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一贯坚持的道路，反对庸俗经济学家、孟什维克和走资派因袭往复的企图。我们注意到了像周恩来这样彻底的革命者却不能彻底科学思考的历史，也注意到了今天很多向往马克思主义的同志却用非马克思主义思考的现象，认为有必要分析造成这一困难的思想方法原因。列宁曾在1913年致信高尔基，批评试图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进派”不明白“马克思主义是比他们所想象的更严整、更深刻的东西。”（《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四十六卷第230页）。马克思主义的各个部分、各个命题和结论之间，早已经过了系统的逻辑加工和多次历史检验，对之的发展和运用需要考

虑与这个严整体系中各个环节的关系，因此以掌握这门科学为前提。如果不了解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与剩余价值理论的联系，不了解学者劳动的非生产性，不了解这一区分对纯洁无产阶级队伍和有意识争取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的意义，不了解历史上就此问题展开的长期斗争，就贸然宣布学者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那么将不会促进工人基于科学世界观才能成功的事业，而是成为这个事业不自觉的障碍。有一些同志有较好的自然科学修养，能理解自然科学的严整性，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却比较随意，我们也想举一个自然科学的例子。伯努利方程是流体力学的基础方程之一，一方面它是能量守恒定律在流体力学中的应用，另一方面它是一系列工业设计，比如飞机设计的著础。承认能量守恒定律，就必须承认伯努利方程，而否定伯努利方程，就必须反过来推翻能量守恒定律。没有人会这样去做。同样地，承认剩余价值理论，也必须承认非生产劳动者的小资产阶级性及其动摇性。因为不了解这种严整性而去否定这一界限的严格性，表现了一种缺乏修养的自发状态。这种自发状态需要自觉去克服。精读《列宁全集》，则是用一两年时间去自觉克服这种缺陷的最佳办法。

最近一位青年同志开始阅读《列宁全集》，我问他感受如何，他回答说：“原则性增强了。”这正是修养提高的明显表现。我们不仅应当在阶级界限问题上具备原则性，也应当在一切重要问题上具有原则性。目前因为缺乏修养而不理解这种原则性，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情形下的自然现象。我们一定能够克服这种障碍，正如列宁所说：“只要能认识到缺点就行，因为在革命事业中，认识到缺点就等于改正了一大半！”（《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六卷第31页）

论组建新的工人政党

杜烈凝

2021 年，黑帮专制政府庆祝了他们建党一百周年。这个党在建立之初是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党。在 1976 年抓捕党内革命力量的政变之后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复辟了资本主义的法西斯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直接的敌人。那要不要组建一个新的工人政党呢？组建新的工人政党在专制政府肆意抓捕异见人士的中国是否可能呢？这个新组建的工人政党会不会在取得了政权之后又变质呢？这是关于组建新的工人政党的三个主要的疑问。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即组建新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对这种必要性的怀疑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主张改造当前的共产党，使其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另一方面认为组建新党不是工人运动的促进因素，反而因其集中制和官僚主义将成为工人运动的障碍。主张改造当前共产党的观点，主要论据有四：一是这个党并没有彻底改旗易帜；二是会被帝国主义利用引发内乱中断民族复兴；三是左翼力量弱小，另组新党是以卵击石；四是没有毛主席这样的领袖，革命很难成功，因此应该讲究策略，避免“左”倾盲动，通过唤醒民众来压迫这个共产党回到社会主义轨道。这四个论据都是不成立的。所谓彻底改旗易帜，就是改掉共产党的名字。但是看待事物的性质不能看它叫什么名字。第二国际中的各国工人政党，有不少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起来并长期指导的。这些党变质后，并没有改旗易帜，而是仍然叫原来的名字，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如此。列宁根据这些党纲领上的改良主义和政策上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等，确认了这些党不再是工人政党，并且为了与之区别开来，将俄国党的名字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成了俄国共产党。从此以后各国革命的工人政党都叫共产党，不叫社会民主党了。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取消一切民主自由权利，在经济上恢复了雇佣劳动制度，在文化上宣传民族主义和传统文化，早已完全背弃了工人阶级，背弃了马列主义。从这个党的阶级属性上来看，它不仅丝毫不代表工人阶级，而且是工人运动直接的镇压者。用共产党这个名字来改变它的阶级属性是

极其肤浅的诡辩。如果说第一个论据改良色彩浓厚，那么第二个论据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色彩就很突出了。稳定的资本主义秩序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是非常惬意的，但这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内乱。革命的日子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是相当糟糕的，但这意味着工人阶级已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内乱状态而觉悟和组织起来。民族复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责任，在各自国家里推翻资本主义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用民族复兴代替共产主义，本身就意味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渗透进了马克思主义。第三个论据颠倒了因果：工人力量弱小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政治力量，因而无法觉悟和组织，并非工人力量弱小导致了不能组党。组织起来的工人无所不能，没有组织的工人一事无成。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阶级结合起来的唯一办法，是组建一个一开始主要是知识分子的党。通过这个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宣传组织工作，在工人阶级中创造出一个自觉支持党的先进阶层来，从而让工人阶级从乌合之众变成自己解放自己的力量的同时，也让这个知识分子为主的小党，由于大批工人党员的加入，变成一个工人为主的大党。拒绝这个过程，工人力量弱小的状况将一直持续下去。最后一个论据是缺少领袖，革命难以成功。这里隐含着一种神秘主义的观点，那就是领袖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仿佛领袖先于革命出现。其实领袖是在革命过程中锻炼出来的，那些较有原则性又较有经验的革命者，会逐渐赢得工人阶级的拥护。这里的原则性和经验丰富，对于革命成功都必不可少。我们想强调一下原则性的意义，原因有三：一是原则性是经验丰富的前提，没有原则性，经验就不再是革命经验了；二是今天资产阶级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主要是所谓的“实事求是”，这种氛围造成左翼甚至马克思主义者都较重视实践经验而轻视原则；三是在俄中两党历史上，建党时的两位领袖（普列汉诺夫和陈独秀）的错误，都是丧失了原则性而非缺乏经验。普列汉诺夫在 1903 年二大后明确指出孟什维克错误，但他因为不能割断与孟什维克的个人关系而倒向了孟什维克。陈独秀则是在 1927 年放弃了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原则，之后更是倒向了合法的改良道路。主张改造当前共产党，攻击组建新的工人政党的论据都不能成立，其性质是改良而非革命的。由于其维持了工人阶级一盘散沙的状况，不仅为专制政府续命增寿，而且在必将到来的民主革命中将领导权交

给了自由派资产阶级。不彻底摆脱保党救国的思想束缚，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组织将无从谈起。

对组建新的工人政党的另一方面的怀疑，已经摆脱了保党救国的改良思想，但认为传统的政党道路今天不仅不可行，而且会成为工人运动的阻碍。持此方面怀疑的人，多倾向于去中心化的动员方式，认为这种方式较为民主，不会因为集中制而受到官僚主义的侵扰。由于网络和自媒体的发展，似乎这种观点可以得到更大的支撑。无论是其消极的质疑，还是其积极的主张，都是不正确的。工人阶级只有在战场上才能争得自己解放的权利，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建立社会主义。要暴力革命而不要组织，不要政党，这是很难想象的。不仅暴力革命需要党，准备暴力革命的所有阶段，包括对工人的宣传、组织和领导工人的总罢工等，哪一个阶段都离不开工人政党。列宁认为，集中制是工人阶级政党的第一组织原则。在这个问题上，他甚至在准备建党的时候就饱受非议。列宁很清楚，集中权力于几个人甚至一个人，可能由于其无原则和无经验造成巨大的失败；但他同样很清楚，没有集中制所形成的集体行动能力，工人就不可能击败掌握着高度集中和高度组织的国家机器的沙皇专制政府。集中制的政党是工人重新建立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质疑这一必要条件，主张去中心化，实际上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工人阶级的政党其实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府，它先用党的科学宣传对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再用党的组织去对抗资产阶级政府的组织，最后用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暴力对抗资产阶级的暴力国家机器。否定作为无产阶级政府的工人政党，就保持了资产阶级单方面对无产阶级进行有组织的阶级斗争的局面，维护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无政府主义因此成为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其世界观的基础是个人主义，是用否定集中政治组织的方式让工人服从于专制政府的集中政治组织。

组建新的工人政党对工人阶级来说是绝对必要的。新的工人政党的建立，将是中国工人阶级从零星的经济斗争提高到有组织的政治斗争的标志。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政治自由，专制政府恣意妄为的国家里，有可能建立起来新的工人政党吗？新的工人政党需要思想、政治、组织、技术等方面的一系列条件。只有

具备了这些条件，新的工人政党才能建立起来，走向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成先进群众自觉拥护的大党。与许多人认为建党的主要困难在于技术上难以隐蔽，因此不可避免遭到组织上的破坏，革命者被抓捕和迫害相反，建党真正的困难不在技术方面，而在思想、政治和组织方面。在推翻专制政府的革命过程中，绝大多数时候技术上的优势都不在马克思主义者一边，因此挫折、失败乃至流血牺牲不可避免。马克思主义者只有通过自己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潜力的发挥，在群众的自觉支持下去克服技术上的劣势，才能最终击败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者在思想上的优势就是拥有完备的科学世界观，了解革命的主要阶段和主要困难，以及如何去克服。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优势就是站在工人阶级一边，在对抗尖锐化的时候能够得到工人阶级先进阶层的自觉支持。马克思主义者的组织优势在于其队伍是建立在思想政治上一致的革命者联合，其牢固程度是任何建立在升官发财的梦想之上的专制政府组织所不能比拟的。只有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优势尽量发挥出来，新的秘密工人政党才能真正建立起来，才能到工人里去做工作，启发工人的觉悟，才能最终在技术和力量上超过黑帮。希望回避思想、政治和组织方面的斗争直接取得技术和力量上的优势，是一种反历史的幻想。

在 2021 年的中国，存在这些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条件吗？不存在，因此直接建立新的工人政党是不可能的。即便形式上建立起来，选举了领导机关，发表了宣言，党实际上也因缺乏基础而不存在。思想上的一致是政治上一致的前提，政治上的一致是组织上一致的前提。这一系列条件都不会由于历史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自动出现，而是需要马克思主义者用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黑帮专制政府也非常清楚，一旦成立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强大的工人阶级政党，那么在技术和力量的比拼中自己一定会被埋葬。它的高级官僚都是统治经验丰富的流氓，非常重视在群众生活日益恶化的形势下加大灌输宣传的力度，既培养群众中愚昧的民族主义者支持自己，也在革命者中扩散愚昧精神，破坏思想统一的进程。不得不承认，这些老练的奴隶主到目前为止在这方面还相当成功。黑帮们的成功，难道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尽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去奋勇回击专制政府着力加强的灌输吗？而如下这

样的观点正是这种灌输的直接结果：这个背叛了自己工人政党光辉历史的黑帮党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政治上层建筑，不是工人阶级的主要敌人，不是革命的首要对象，而是阶级属性似乎可以避而不谈的民族复兴的领导力量；因此非但不应建立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将之推翻，而且应该保护它不受自由派的攻击和影响。只有彻底摆脱这样混杂着专制政府刻意散布的改良主义、民族主义和取消（秘密党）主义的意识形态毒药，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思想一致基础上的政治一致和组织一致走向无产阶级群众才是可能的，社会主义才是可能的。

最后一个是：这个新组建的工人政党，会不会在工人阶级的支持下夺取政权之后，又背叛工人阶级呢？这种危险无疑是存在的，但不应将之看作一种宿命。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宿命论者，而是决定论基础上的能动论者。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告诉我们，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就一定会相应的上层建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总会渗进无产阶级的队伍。这种情况并不是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才出现，而是会贯穿共产主义实现前的一切历史阶段。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受到腐蚀，在革命胜利前就存在，表现为放弃革命，主张改良；而革命胜利后也存在，表现为放弃继续革命，主张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继而复辟资本主义。是斗争，而且只是斗争，才能够维护新的工人政党既不在革命胜利前变质，又不在革命胜利后变质。斗争中的关键一环是诉诸群众。无产阶级中觉悟阶层大于党而小于阶级，在选举中能主动投党的票，平时能自觉执行党的决议，响应党的呼吁。必须通过教育和宣传创造并扩大这个觉悟阶层，才能在斗争中战胜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这将是革命胜利的保障，也将是防止革命政党在取得政权后复辟资本主义的保障。而能够辨别党内不同派别的路线差别，支持革命路线和继续革命路线，反对各种修正主义的改良和复辟，也将是无产阶级觉悟和成熟起来的标志。

简评郑州外国自由派记者遭围攻

傅萍

郑州一些群众围攻外国记者，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忧大于喜。特色掌握政权，镇压一切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意识形态上主要依靠民族主义。河南共青团说了大实话，号召群众去问候外国记者，就是希望工人和其他群众把中外对立放到阶级对立之上。自由派反对特色类型的上层建筑，但不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在这两者的左边，还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马克思主义者。群众能够识别自己的次要敌人，但不能识别自己的主要敌人，而且潜在地支持了自己的主要敌人，说明特色的宣传是比较成功的，马克思主义者则任重道远。列宁说：“只有群众才能创造真正的政治，可是，无党性的、不跟着坚强的党走的群众是没有觉悟的，没有自制力的乌合之众”。（《糊涂的无党性分子》，列宁全集 24 卷）马克思主义者不清理自己思想中的修正主义、改良主义、民族主义，不与统一战线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背叛做斗争，就不能真正组织起自己的队伍，领导统一战线，并向特色发起进攻。

脑力劳动者是无产阶级吗？

杜烈凝

最近朋友转来一篇题为《对于“脑力劳动者是小资产阶级”这一主张的批判》的文章（原文地址

<https://telegra.ph/%E5%AF%B9%E4%BA%8E%E8%84%91%E5%8A%9B%E5%8A%B3%E5%8A%A8%E8%80%85%E6%98%AF%E5%B0%8F%E8%B5%84%E4%BA%A7%E9%98%B6%E7%BA%A7%E8%BF%99%E4%B8%80%E4%B8%BB%E5%BC%A0%E7%9A%84%E6%89%B9%E5%88%A4-08-10>），称其对我们之前的文章进行了反驳。通读其文，这篇争论文章似乎不是针对我们之前的文

章，而是另有所指；但其观点的错误和论证的幼稚，正是我们的文章所反对的。

脑力劳动者不一定是小资产阶级，但大部分是。文章作者完全不理解生产劳动的概念，也完全不理解劳动价值论，根本意识不到其主张在理论上会否定劳动价值论，在实践中会造成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非生产劳动者，即小资产阶级劳动者混入无产阶级的阵营。

我们没能看到红星同志的论述。按照这篇争论文章，我们猜测红星先生大概相对于自己的批判者是对的，虽然和自己的批判者一样，不理解生产劳动和雇佣劳动的概念，因而把脑力劳动者的全部，而不是大部分看作小资产阶级了。从经济理论上讲，与物质生产领域的可变资本相交换的脑力劳动是雇佣劳动，其生产关系的人格化承担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红星先生的批判者所强调的教师等大部分脑力劳动者，因其劳动与资本收入，即表现为财政收入的剩余价值相交换，不是生产劳动者，不是雇佣劳动者，不是工人阶级一部分。至于小资产阶级收入和生活条件劣于无产阶级，这是其坠落到无产阶级的前兆，不能作为其是无产阶级一部分的论据，要不然挣扎在贫困线下的小农，就比工业无产阶级更有工人阶级的资格了。

更值得警惕的是，从各个方面模糊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界限的企图，成为今天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而不划清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在各方面的界限，就不能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因为模糊这种界限的实质，是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代替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思想，将鼓动的重点从产业无产阶级转变为脑力劳动者中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将鼓动的内容从革命的国际主义转变为改良的民族主义。我们应当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系统性，捍卫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严格的阶级界限，捍卫革命观点拒绝改良。当然，我们还应当指出两点：一是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严格分野并不妨碍与小资产阶级组成民主统一战线去反对特色专制政府，而且民主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以无产阶级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分化出来为前提。二是无产阶级注意到小资产阶级两面性中反对资产阶级及其专制政府的民主革命要求，力图引导小资产阶级走革命道路，这同样是以无产阶级与小

资产阶级的严格分野为出发点的。

最后，我们主张，对特定经济集团的看法，首要的是其政治观点，而非经济地位。我们强调经济地位上多数脑力劳动者的非生产劳动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只是因为我们的预见到这些小资产阶级集团，由于其经济地位，不能不表现出动摇性来。如果这些阶层能预感到其大多数必然坠落到无产阶级的命运，我们是非常欢迎的。

装点门面的左派的合唱与工人运动的危机

杜烈凝

列宁曾说：“一切想要影响工人的资产阶级政党都很愿意有一个装点门面的左翼。”这样装点门面的左派在 2018 年佳士事件后，特别是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大批地出现并逐渐合流，造成了工人运动深刻的危机。我们先来谈一谈装点门面的左翼的表现和实质，再来谈谈它的历史，最后谈谈工人运动面临危机时的出路何在。

装点门面的左派最突出的表现，是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即所谓爱国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用不同国家间的民族对立掩盖同一个国家内部的阶级对立。比如在抗击疫情的问题上，一方面无耻地赞美特色专制政府的抗疫成就，另一方面把这种成就说成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战争的胜利，而这两方面判断的依据，都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相应的状况。列宁批评第二国际的沙文主义者时曾说：“有些社会党人在自己的政府面前解除武装而专门揭露和辱骂别国的部长和统治阶级，他们扮演的是资产阶级著作家的角色。”说的不正是这些在今日中国装点门面的左派吗？特色专制政府曾在抗疫初期封锁消息，努力掩盖疫情真相，抨击敢于直言的医生，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人民对这个政府的深刻仇恨。群众的斗争情绪，本应加以保护和发展，以造成政府的危机，并引导群众利用这一危机去推翻特色专制政府。然而现实的情况是，特色专制政府正是在自己有意扶植的这些装点门面的左派的帮助下，将群众

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更加失败的西方政府身上，特色专制政府则获得了抗疫英雄的虚假形象。说什么特色专制政府成功的原因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人民战争，则可以说得上是厚颜无耻了。特色专制政府胜过西方的基础是国家资本主义，即在依靠国有资本直接抗疫的同时，由国家监管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解决物资供应问题。这跟觉悟的群众自觉支持无产阶级政党的人民战争毫无共同之处。自然也有装点门面的左翼毫无底线地高喊群众的觉悟，而这只不过是通过迎合群众中受到特色专制政府影响的小资产阶级和不觉悟工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来给特色专制政府涂脂抹粉罢了。对于这种不是让无产阶级仇恨资产阶级专制政府，而是让无产阶级爱戴政府的叛徒行径，我们不能不表示特别的愤慨。在抗疫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把国内的阶级对立提到首位，不能不广泛宣传如下的真理：特色专制政府必须为疫情初期重大的人员伤亡负责；必须为疫情后期付出巨大经济社会代价仍出现多次反复负责；必须让群众真正参与到抗疫过程中，组织各级群众组织监督和领导抗疫工作，防止例如南京机场疫情反复的情况等等发生；为此，就必须对国家制度进行彻底的民主改造，用工农劳动者的政府代替特色专制政府。

马克思主义者与装点门面的左派的对立，当然不仅表现在是不是要在抗疫中批评特色专制政府并提出民主要求来。在一切装点门面的左派配合特色专制政府用民族对立掩盖国内阶级对立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将国内阶级对立提到首位，拒绝承认特色专制政府代表全民族，从而代者自己。例如在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中，应坚决拒绝承认中国政府的奥运代表团代表自己。应一方面大胆揭露中国的劳动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群众——普遍缺乏体育锻炼的时间和条件，身体和精神饱受摧残；另一方面指出运动员们在政府政绩压力下普遍过度训练，而大多数运动员在退役之后和工人阶级一样缺乏生活特别是医疗保障。应特别注意用国际主义的精神教育群众，以与特色专制政府的民族主义教育相竞争：不仅中国的工人阶级和运动员处境悲惨，而且各国均是如此；各国工人阶级应当互相接近，而不是与本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相接近。

装点门面的左派为特色专制政府摇旗呐喊，模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真实作用，

是用“左”的面目掩盖起来的。他们抨击国内外资本，但绝不抨击代表资本镇压工人的特色专制政府；他们承认中国革命，甚至是文化大革命，但不承认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性质，不承认特色专制政府是这个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不承认应该建立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工人阶级和其他民主派群众用暴力手段推翻特色专制政府。可以说，这些用“左”的面目掩盖起来为特色专制政府装点门面的派别，在一切方面都表现出这种两面性和动摇性，表现出明显的小资产阶级性。这种两面性的小资产阶级，正是装点门面的左派的阶级实质。这一小资产阶级实质，有一非常突出的表现，那就是只讲“群众”和“人民”，而不讲阶级，特别是不讲无产阶级。其用意非常明显，那就是用“群众”和“人民”内部的统一性来掩盖其中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区别。特色专制政府对无产阶级群众的意识形态操纵，是通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对无产阶级群众的思想领导，通过用“左”的面目为特色专制政府装点门面实现的。不认清民族主义者用“左”的面目掩盖的小资产阶级性，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者从左翼中独立出来，谈不上摆脱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更谈不上反过来领导小资产阶级同特色专制政府进行坚决的斗争。

俄国小资产阶级在十月革命前曾有过两次从革命阵营中分离出去的历史。第一次是小资产阶级的民粹派从民主革命阵营滑落到改良阵营，第二次是小资产阶级的孟什维克从俄国工人政党中滑落到社会沙文主义阵营。中国当代的小资产阶级，正处在类似俄国小资产阶级第一次转变的节点上。可笑的是，他们特别反对关于民粹主义的攻击，可能隐隐约约感受到他们自己就是今天的民粹派吧。我们也预备着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出现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叛徒，预备着他们同今天这些装点门面的左派的合流。无论什么时候，这些叛徒从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中分离出去，都不是坏事，因为真正无产阶级的觉悟阶层，只有在清除了这些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的影响之后，才能真正发展起来。

在这里，必须特别注意装点门面的左派的一个历史论据，即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曾支持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要求，因此今日同样应该防止中国变成西方列强的殖民地。说这些装点门面的左派在歪曲毛泽东方面打破了世界纪录，是毫不为过的。

这个纪录的原有保持者是特色专制政府，但特色专制政府毕竟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因此是在毫不掩饰地否定毛泽东，而这些装点门面的左派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歪曲毛泽东，因此具有特别的迷惑性。毛泽东支持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要求，原因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有建立民族国家的民族民主需要。今天，中国的民族国家早已建立，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废墟的基础上已然得到充分发展，马克思主义者在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支持建立民族国家的客观条件早已消失。此时引证毛泽东在那时正确的民族民主主张，就是为今日的中国帝国主义辩护。今天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第二大经济体。那种认为中国不是帝国主义，而是外国资本主义的看法，实际上赞成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们的看法，即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基础上必然产生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一种可以选择有，也可以选择没有的政策。今日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借鉴的不是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而是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策略，原因正在于中国建立民族国家的要求已经实现，与美国的斗争不是民族解放性质，而是帝国主义性质。

工人运动目前面临深刻的危机。特色专制政府在装点门面的左派的帮助下，正用民族主义吸引工人放弃自己的社会主义要求，转而支持自己。群众时而对专制政府恨之入骨，时而感激专制政府，正是这种危机的明显的征兆。特色黑帮已经利用工农子弟的牺牲在奥运会的赛场上与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竞争，未来还会利用工农子弟的生命在帝国主义的战场上与其它帝国主义竞争，意大利这个“穷人的帝国主义”曾经依靠国内工人阶级的不觉悟打垮了土耳其，原因正在于当时意大利的左翼倒向了社会沙文主义。今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绝不能重蹈覆辙，通过宣扬民族主义帮助特色黑帮欺骗工人。要避免中国工人运动从深刻的危机走向彻底的失败，今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面临两方面的艰巨任务：一方面必须与装点门面的左派，即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划清界限，另一方面设法走向工人群众，形成工人阶级中的先进阶层。中国与其它帝国主义的竞争，特别是战争，必将造成群众生活的极端困苦和特色专制政府的统治危机。如果在专制政府处于危机的时刻，工人运动也由于机会主义的影响处于危机之中，那么革命会由于只有客观条件而无主观条件而不能发起，即便

发起了也不能成功。只有既与机会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装点门面的左派划清界限，又在工人群众中培养这样一个支持彻底革命策略的先进阶层，运用特色专制政府的帝国主义冒险造成的革命形势并走向社会主义才是可能的。

中特提出“共同富裕”的口号意在何处？

杜烈凝

中特面对疫情之后群众生活日益困难的局面，开始高喊“共同富裕”的口号。我们从中共中央财经会议第十次会议的报道中，得知了中特对“共同富裕”这一口号的主要解释。哪怕从中特自己的解释来看，这一口号也必然是欺骗性的。

这份报道中，中特首先肯定了自己的历史成就：既肯定了整个改革开放，即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又肯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6亿人口月收入在1000元人民币以下的社会是全面的小康社会。如果月收入1000元以下就可以被中特称为小康，可能我们对中特的富裕标准也不能有太多的期待。

报道继而肯定了现在的“基本经济制度”，即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虽然所谓“基本经济制度”中还保留着公有制为主体的表述，但一来这样的公有制实际上是国家资本主义，并非社会主义性质，二来这样的公有制内部也早已经是雇佣劳动关系，不是社会主义的劳动关系。报道提出要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更是直接讲要鼓励新兴的资本家。可是每一个新涌现出来的资本家的发财致富，不正是以更多的雇佣劳动者的贫困为代价的吗？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哪怕我们接受“共同富裕”这样的不科学的概念，这也是无论如何实现不了的。

而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办法和实际举措，我们用放大镜找了半天，只是勉强找到三个可能称得上的：一是在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之外，再加上三次分配，即用税收、社保和转移支付的办法来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二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三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所谓三次分配，是臭名昭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中国首先提出来的，目的是在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剧烈两极分化的基础之上，在政府缩小过大的贫富差距失败以后，由资本家用慈善的方式救济那些生活无以为继的人。这只不过是让资本家把自己剥削得到的巨款中的零头拿出来，让工人们把对他们强烈的仇恨转变为一颗感恩的心罢了。工人不应当向资本家乞讨，应该理直气壮地用革命方式拿回本就属于自己而被反动政府和资本家窃取的一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一种人人形式上平等的民主主义要求。资本主义社会中有无数这样的要求，但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绝对不可能完全实现。中特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拿着属于全民的财政资金去为自己建立特殊医疗体系的公共服务上的不平等现象，靠他们自己是不可能消除的。所有类似的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其它民主主义的要求，工人阶级应该加以全力的支持，并且声明：这样的要求不通过群众的坚决斗争，不通过一系列的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至于所谓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正如“扶贫”一样，不过是把农村里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改造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特意图在农村建立起一个富农阶层，即主要依靠剥削雇佣劳动来发家致富的阶层，来作为自己在农村统治的基础。而城市工人阶级则能在农村的雇佣劳动者中找到自己可靠的同志。

中特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想通过一些自上而下的小修小补，来缩小巨大的贫富差距，并缓和正是在这个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是注定要失败的。但“共同富裕”这样的欺骗性口号，却能起到非常真实的社会作用，那就是动摇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中特专制政府很清楚自己这个口号在经济社会层面能造成的实际改变不可能很大，报道中就很直白地说“要加强促进共同富裕的舆论引导，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良好舆论环境”。也就是说，让群众在主观上相信共同富裕，比群众过上群众认知中的富裕生活，要重要得多。这样的欺骗，意在“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也并没有什么遮掩。资产阶级也不会相信“共同富裕”的口号。只要不触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那么用慈善的方式少交更多的税，还能让群众眼中的仇恨变成感恩，又何乐而不为呢？觉悟的工人不会相信“共同富裕”的口号，

毕竟赤裸的现实生活每天都在教育着工人：工人努力工作只是实现了剥削自己的资本家的富裕。只有那些对特色黑帮和资本主义抱着幻想的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幻想不经过重大的斗争就能有重大改善的小资产阶级，才会轻信特色黑帮几乎不加修饰的欺骗。这种幻想对无产阶级意识上的的腐蚀所造成的严重损失，远大于无产阶级经济上的微小改善，何况这种微小改善还只是许诺而已。

劳动群众，即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摆脱特色资本主义中日益艰难的处境，不但可能依靠特色黑帮的“共同富裕”，甚至对特色黑帮这一口号的任何兴趣，都会阻碍自己境遇的改变。因为劳动群众从专制政府和资本主义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只能依靠自己指向社会主义的斗争；而对特色黑帮欺骗性口号的兴趣，则会败坏这种斗争所基于的无产阶级意识。只有摆脱这种意识，不相信特色黑帮的任何诺言，劳动群众才能迈出走向解放的第一步。

拿着马列毛主义的武器走进现实——答羊肚对佳士抗争的分析

傅义武

《列宁道路》频道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发布了成文于 5 月 4 日的《佳士抗争的正确路线和错误策略》(<https://telegra.ph/right-line-and-wrong-tactics-05-04>)，引起了一些讨论，《星火导刊》杂志也予以转载。这篇文章肯定了佳士抗争是自觉的社会主义斗争，有集中制的组织，并进行了走向工人的尝试，分析了其策略上的冒险主义和组织上的集中制缺乏民主讨论去配合，结论是要坚持正确方向并改变策略错误，在思想统一的基础上施行全国政治报计划。

羊肚于 2021 年 9 月 3 日发布了题为《伟大的正统的空谈者——评〈佳士抗争的正确路线和错误策略〉》的评论（<https://telegra.ph/the-Great-Orthodox-Prattler-09-03>），批评上述文章“缺点就在于离‘马列毛’的教条太近，而离现实

太远”。羊肚说曾经的北马即是这样的正统的空谈者，但这样的马列毛教条一到现实里就不灵了，培养不了觉悟工人，加之北马误判 2018 年的形势，导致了佳士抗争一定会发生。羊肚还认为民主集中制不可能实行，因为佳士抗争的一线参与者根本不知道上层的政治架构，而且当时的气氛也不允许对冒险主义路线的批评。羊肚的结论是文章作者是和北马一样的正统空谈者。至于羊肚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建议，并没有直接给出，从行文的逻辑来看，大概是要从现实出发，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甚至羊肚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态度本身，似乎也不那么明确。

被羊肚批评为“正统”，即坚持马列毛主义，是北马和作者的光荣。羊肚自认为有“常识”，我们提醒他“常识”被黑格尔称之为“偏见的集合”。在羊肚的评论中，我们认为最有价值的不是他对佳士抗争的分析，而是他提出的科学理论与现实之间关系的问题。我们也不准备与羊肚抽象地辩论科学理论与现实的关系，因为这样做无非只能得到一些类似于科学理论与现实同样都很重要这样的一般性的结论。我们打算先谈一谈列宁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的具体内容，再看看现实中发生的佳士抗争在这一科学体系中的哪个位置，这样读者就能自己从中看到为什么我们会得出被羊肚所批评的结论，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让读者预知以后还会发生什么样可能的挫折，以及如何应对。

列宁主义一般被称为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概括反映了列宁主义的时代条件。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列宁主义产生的其它条件：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经济基础，毫无政治自由可言的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泛滥的文化环境。列宁主义是在这些条件下于一系列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民粹派否认俄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列宁与之斗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对俄国现实的适用性；合法马克思主义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列宁与之斗争指出只有暴力革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党否认群众政治工作的必要性，列宁与之斗争指出只有启发群众觉悟才能推翻专制制度；经济主义否认进行群众政治教育的迫切性，列宁与之斗争指出必须对群众进行全面的政治教育，才有进行暴力革命的阶级队伍；孟什维克否认组建集中制政党的必要性，列宁与之斗争指出只有坚持建

立民主集中制的党，才能对群众进行全面的政治教育并领导无产阶级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阶层；孟什维克在 1905 年革命中否认无产阶级领导权，列宁与之斗争指出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推翻专制制度的革命，革命才能成功；1905 年革命失败后，取消派要在专制制度下建立公开的党，列宁与之斗争指出必须坚持走建立秘密党、发行秘密刊物去培养无产阶级思想觉悟的老路，并在 1912 年艰难地重建了布尔什维克党；1914 年帝国主义战争爆发，绝大多数国家的党从本国“实际”（应读作：资产阶级思潮）出发要保卫祖国，列宁指出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都要实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路线，支持而且只支持其它国家坚持这个路线的派别。

我们仍然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我们在其中斗争的国家没有政治自由，我们看到了一系列小资产阶级思潮的泛滥。当代中国的民粹派同样不同意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本主义，而是要和俄国的民粹派一样通过村社挽救逐步资本主义化的农村，只不过当代中国的民粹派不称之为村社，而是称之为合作社。当代中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们同样存在，不少所谓“左派”坚决反对建立新党走向群众进行暴力革命（见范井冈的相关言论）。佳士抗争自然超出了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界限，是自觉的社会主义斗争，但其摇摆向社会革命党类型的政治冒险主义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相当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并不在于羊肚所恐惧的不可能在工人中培养出觉悟部分，而在于克服自发性需要一个过程。列宁曾在《怎么办？》一书中讲恐怖主义和经济主义同样是自发倾向的表现，都没有发挥自己进行政治鼓动和政治组织的自觉性；区别在于经济主义崇拜群众自发性，而恐怖主义则崇拜知识分子自发性。这里的恐怖主义正是讲的社会革命党所进行的政治冒险主义的暗杀行动。列宁认为，这种政治冒险主义没有把觉悟力量用于办全国政治报，形成代办员网络，并走向工人团体，从而在实质上建立有工人阶级觉悟阶层自觉支持的秘密政党。羊肚说在佳士工厂的手工业工作方式毫无进展之后，为了维护组织、路线和革命理论的正确性和权威性，就必然走向政治冒险主义。我们要对他大声说不，并且告诉他，在手工业方式进展不大的时候，应该走向全国政治报计划！羊肚批判政治冒险主义，然而我们在这里发现，他却仍然在用政治冒险主义的方式思考。原因不在于他缺乏其它主

义的“常识”，原因在于他缺乏马列毛主义正统的“常识”。作者把这样的偏见自诩为“细致的对佳士事件的历史研究”，把评论对象称之为“宣传材料”，也是由于他头脑中的这些“常识”在起作用。我们还非常希望羊肚把自己的正面见解拿出来，让我们看一看这些见解比起我们的全国政治报计划高明在何处，用羊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只希望他在宣传的时候所说的话是没有保留地真诚的！”

在这样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思潮氛围中，种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在运动的各个阶段依次或强或弱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肯定佳士抗争的正确路线，是因为它不仅完全把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甩在了身后，而且预示了未来斗争中一系列的正确原则。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 1895 年：列宁在那一年组织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被沙皇剥夺了五年的自由，我们则经历了佳士抗争的失败。我们接下来会为这样的“伟大的正统的空谈”而努力：要有自己的《火星报》，要有自己的代表大会，可能在分裂后遭受 1905 年那样的高潮和失败，那时我们仍然要努力坚持这条老路。我们一定会遭遇帝国主义战争，一定会有许多人倒向政府一边去“保卫祖国”，我们依然要坚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老路，不给特色政府任何支持而致力于推翻它。今天我们不会再用俄文印刷机去印刷纸质报纸，而会用电子版的报纸去传播革命思想。代办员之间不会再用化学墨水写的邮寄信件去联络，而是用电报这类的保密网络通讯。农民土地要求不再存在，推翻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需要怎样的经济动力，也需要现实生活告诉我们。这是可以为现实改变的地方。而办秘密政治报纸、建立秘密党、形成无产阶级中的先进阶层、领导反专制的民主革命、暴力推翻专制政府并建立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这些正统原则，我们不会也不可能因为“现实”和“常识”而改变。

评孟晚舟回国

傅义武

特色政府的媒体正在大肆渲染大资本家、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回国一事，使用了引人注目的“孟晚舟即将回到祖国”这样的标题。这样的说法又对又不对。说它对，是对资产阶级而言，因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是大资本家的祖国。虽然孟晚舟是中国香港籍，而且在 2003 年第一次到访温哥华之后就是加拿大永久居民（2009 年到期），但特色黑帮仍然认为必须把她救回来，甚至为此放弃一点民族利益，用释放两个加拿大间谍来交换也在所不惜。说这个标题不对，是对无产阶级而言，因为它暗示所有的人，不管这个人是工人阶级的一员，还是资产阶级的一员，都会受到这个祖国的保护，都应该热爱这个国家，都应该支持黑帮专制政府。

工人应该识破这样的欺骗。马克思讲工人没有祖国，特色黑帮抓住每个机会向工人灌输工人应该热爱祖国。孟晚舟事件不过是一系列欺骗性宣传中的一个新的环节罢了。到底是马克思说得对，还是马克思说的过时了，特色黑帮说得对呢？我们不妨来看一看那些滞留在海外、无法回国的工人的状况。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由于特色黑帮在抗击疫情的活动里没有也不可能走群众路线，导致输入性疫情持续不断。他们当然不可能反思自己的抗疫路线，因为发动群众的结果可能是群众不仅要求参与抗疫，而且要求参加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于是他们采取了限制海外中国工人回国的办法。比如说，中国工人数量很大的沙特阿拉伯，每周只有一个航班飞往中国大陆，机票高达十万元人民币一张。特色黑帮没有说工人不能去买，但问题显然在于，十万元一张的机票，工人买不起，只有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上层才买得起。海外中国工人回国的权利就这样被剥夺了。可以想像这些工人在海外过着怎样艰辛的生活，而孟晚舟是乘坐中国政府的包机回国！大资本家任正非的“长公主”独自享受一架特色包机，数百万工人阶级事实上被剥夺了回国的权利，这个政府是谁的政府，这个“祖国”是谁的祖国，可以说是一清二楚了。

特色黑帮渲染他们营救了资本家，让所有人、包括工人阶级在内，都把自己想像成

资本家。但事实上工人阶级与孟晚舟这样的大资本家，以及这些大资本家的特色黑帮政府，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中国境内的工人阶级和海外的中国工人阶级，以及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处境和利益才是一致的。挑动境内工人阶级与海外中国工人阶级的对立，说什么疫情不断不是由于特色黑帮不走群众路线，而是因为海外工人回国会输入病毒，是特色黑帮让工人阶级的不同部分互相仇恨、从而让自己脱身的招术之一。挑动中国工人阶级与其它国家工人阶级的对立，同样也是特色黑帮让中国工人不与其它国家工人阶级接近而与自己接近，从而阻止工人阶级觉悟和组织的招术之一。

孟晚舟本人自觉地配合了特色黑帮的这一意识形态欺骗。她在中国政府包机上发布了感言，只字不提自己向加拿大检方承认曾向银行作假、承认帮助华为破坏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以换取获释，而是大讲强大祖国营救了她的感言的核心观点可以浓缩为这样的一句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祖国正在走向繁荣昌盛，没有强大的祖国，就没有我今天的自由。”这显然是精心设计的宣传方案中提前准备好的文稿。我们必须指出：中国是一个资本家比较自由的国度，同时是一个工人阶级不自由的国度，而且资本家的自由正是建立在工人阶级不自由的基础之上。

中国的资本家集团是世界上较强大的资本家集团之一。他们与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家集团，即美国资本家集团，必然发生一系列冲突。两个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并不会给两国工人阶级带来什么利益。大老板们为了在国际竞争中击败对手，往往需要进一步压低工人的工资，并用政治上的专制来为压低工资创造条件。列宁讲帝国主义与反民主相联系。今天我们正处在列宁所预言的这样一种历史阶段上。工人阶级应该拒绝资本家和特色黑帮的民族主义宣传，并在这种觉悟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前途去斗争，而不是支持特色黑帮的帝国主义事业。

在无产阶级立场和特色黑帮立场之间，还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立场。泛左翼中许多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历史问题上批判特色黑帮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但他们又在现实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例如孟晚舟回国问题上，支持特色黑帮的民族主义宣传。

这种两面的摇摆性不是偶然的，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们寄希望于特色黑帮的帝国主义行为能够改善中国小资产阶级困难处境的结果。工人阶级不反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这些主张对自己的影响，就不能真正彻底地反对特色黑帮。通过垄断国际市场获得的高额利润，绝大多数都会落进孟晚舟们的腰包，只有一小部分用来改良工人的生活。这种改良既然是资产阶级赐予的，那么也会随时被收回。而这微小改良给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所造成的损害，要远大于这些改良所带来的经济改善。我们可以预料，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中，这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会支持特色黑帮的军事行动，把几百万劳动群众（包括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送上战场去充当资本家之间争夺利润的炮灰。我们必须坚持列宁提出的让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阶级战争的策略。明确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之间的这种原则性分野，清理经他们散布的特色黑帮的民族主义思想影响，将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中重新建立社会主义的条件之一。

列宁道路的内涵和现实意义

傅义武

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让工人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不得不进行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先进思想，早在二十多年前的新旧世纪之交，就随着对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认识的普及，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开来。可惜的是，有革命的愿望，并不意味着找到革命的道路。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二次革命并没有太大的进展。2018年的佳士抗争，这次二十多年里最英勇的尝试，也由于不了解路在何方，由于不能在那条尚在寻找的道路上自觉前进，由于不自觉地走向了政治冒险主义，而最终失败了。如果我们不能细致地发掘这次英勇失败中的经验和教训，那么我们就难以继续前进到更高的阶段。

深入地总结佳士抗争的经验教训，需要三方面的准备：一是需要在理论上进行相关

的研究,看一看佳士抗争在国际共运史所提供的理论框架中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二是需要收集公开的关于佳士抗争的材料,主要是声援团的宣传鼓动文章,分析其中所表现出来的路线主张;三是要寻找佳士抗争的相关人员的回忆录,比如说贺鹏超在被捕后的叛变自白,比如说声援团一线抗争人员的回忆文章。相比较于第一和第二方面的材料,第三方面的材料是不那么重要的,因为第三方面的材料,虽然能够满足一些猎奇的心理,但是对于总结佳士抗争的经验教训而言,主要的作用是用以验证从前两方面的理论和历史材料中得出的结论。第三方面的材料,即使并不完备,也不会影响总结工作的进行。

在这篇文章里,主要想谈的是第一方面的准备。国际共运史中,有几次比较完备的革命经验的理论分析,即马克思对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回顾,列宁对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的准备和分析,毛泽东对1949年革命和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探索和总结。对于我们而言,列宁对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的准备和分析,具有突出的借鉴意义。马克思道路主要是在西欧国家多少具备资产阶级民主条件下爆发的革命的回顾。毛泽东道路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有共产国际帮助建党,逐渐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总结。列宁道路,则是在没有政治自由的专制帝国主义国家里,通过办全国政治报独立建党,培养无产阶级中的先进阶层,通过领导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准备和分析。列宁道路的任务和条件,比起马克思道路和毛泽东道路,与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相似度要高得多。可惜的是,对这种相似度所要求的对列宁道路的了解,甚至这种相似度本身,很多同志都还相当隔膜。因此,我们要专门谈一下列宁道路是什么,它的直接现实意义在哪里。

列宁道路包含六个逻辑环节,列宁为此进行了六次重大的斗争。第一个逻辑环节是在思想上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而且只确立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列宁为此进行了反对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民粹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适用性,核心论据是俄国因为缺乏海外市场,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合法马克思主义承认马克思主义的适用性,但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一种没有能动性的宿命论。

这两种学说构成了当时俄国左翼思想界的主流。乌有之乡近乎于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大杂烩，反对建立秘密的无产阶级政党，反对革命而主张改良，甚至连主张合作社这样的具体想法都和当年民粹派主张村舍类似。列宁道路的这个环节，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完成了。佳士抗争的参与者都是坚定的革命者，早已超越了乌有之乡的改良主义。关于这个环节，推荐的文献是《我们拒绝什么遗产》（选集第一卷）。

主张革命，反对改良，就要找到革命的力量何在。列宁道路的第二个逻辑环节，是要向工人灌输原则坚定的社会主义意识，创造工人阶级中的先进阶层去自觉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列宁为此进行了反对经济派和社会革命党的斗争。由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历史悠久，加工全面，渠道众多，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形成社会主义的革命阶级意识，因此必须对工人阶级进行以政治揭露为主的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灌输。经济派从右面脱离了这个培养工人阶级先进阶层的任务，崇拜工人自发性，主张迎合工人阶级中落后阶层的单纯经济斗争要求，走向了工联主义。社会革命党从“左”面脱离了向工人灌输社会主义的任务，认为需要制造政治事件去刺激群众的情绪，而不是用群众生活中遇到的各种事件去启发群众。列宁指出社会革命党崇拜知识分子的自发性，和经济派崇拜群众自发性，都脱离了对工人阶级和其它社会成分进行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乌有之乡的思想代表之一老田，从右面批评所谓“纯左”（应读作“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脱离了群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走向了自我孤立，表现了乌有之乡类似经济派的对群众自发性的崇拜，取消了用坚定的原则性去培养工人阶级先进阶层的任务。而佳士抗争，则是从“左”面脱离了这个任务。某种意义上，佳士声援团的宣传鼓动起到了政治报的作用，但这种宣传毕竟是为营救被捕同志服务而发展起来的，而不是为了自觉地培养工人阶级中的先进阶层，为了在将来必将到来的危机和革命的形势中推翻黑帮专制政府去努力。佳士抗争在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影响下进行。无论是声援团，还是中毛共，都具有暴力革命、公有制、计划经济、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内容明确的社会主义意识。这是当年列宁所批判的以民粹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社会革命党所不能比拟的。这个环

节推荐《怎么办？》（选集第一卷）。由于我们目前正处在这个环节，因此特别需要对之的研究。系统的掌握这个环节的内容，了解列宁在结束 1900 年结束流放后，如何通过全俄政治报计划将俄国党及其群众基础创造出来，需要仔细精读《列宁全集》第四卷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到第八卷《进一步，退两步》的全部内容。如果每天能读 4 个小时的话，大概两个月可以读完这个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用了十余年时间都没有能够跨越的台阶在逻辑和历史上的总结。列宁在 1887 年被喀山大学开除之后，用了 7 年多的时间系统地学习他能找到的一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我们花两个月的时间去做理论上的一点准备，应该不能算是过分。

向工人阶级灌输原则坚定的社会主义意识，需要一个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列宁道路的第三个逻辑环节，是建立一个地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有秘密中央和秘密的地方组织，发行全国政治报，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列宁为此进行了反对孟什维克组织观点的斗争。列宁在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中主张集中制，坚持党员必须加入支部为党工作的党章第 1 条。马尔托夫主张知识分子所需要的党员不必加入支部的孟什维克党章第 1 条。可是如果接受孟什维克组织观点，第二个逻辑环节，即对无产阶级进行原则坚定的社会主义教育去形成先进阶层，就无从谈起了。事实上，思想影响必须通过组织形式巩固下来，只有组织上统一的党才能保证思想上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能够转变成群众的革命风暴去战胜资本主义。布、孟两派的分裂是悲剧性的，这一或许可以避免的分裂可能让俄国革命的胜利从 1905 年推迟到了 1917 年。两派的领袖，即列宁和马尔托夫，在第二个逻辑环节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共同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同一个省同一条河的上下游，共同在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俄国变种的抗议书上签名，共同流亡海外一起创办《火星报》。如果他们在 1903 年的分裂之前能够有充分的组织见解上的沟通，或许悲剧性的分裂不会发生。那样的话，日俄战争所造成的 1905 年革命形势中，3 万多布尔什维克和 3 万多孟什维克就有可能联合起来，并领导数万社会革命党一起起义，而不是像历史上实际发生的那样，分别起义后共享失败。这也是我们今天进行理论学习和历史总结的意义所在：形成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策略上和军事上的一致见解，减少日后分裂的可能

性。关于列宁道路的这个逻辑环节，推荐阅读《进一步，退两步》。（全集第八卷，只读选集第一卷中的节选是不够的。）

拥有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党，拥有了数十万工人阶级先进阶层的自觉支持，那就要在策略上敢于胜利。列宁道路的第四个环节，是主张建立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通过领导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列宁为此进行了反对孟什维克策略观点的斗争。1905年的革命风暴到来后，迫切的革命需要让孟什维克放弃了自己的组织观点，承认了列宁的党章第1条，但在策略上又认为地主在生产上是大生产，比小农先进，并担心资产阶级退出革命，因而支持自由派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列宁指出大地主经济的农奴制残余多于机器生产，资产阶级一定会退出革命，应与资产阶级争夺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通过工农民主专政为社会主义做好准备。今天中国的资本主义与专制的上层建筑结合在一起，同样存在着改革这个上层建筑的民主要求。这样的民主革命的经济基础和列宁那时不一样了，但通过前三个环节发展无产阶级力量去争取必将到来的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则是一样的。这个环节最重要的文献是《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一卷）。

列宁道路的第五个环节，有一些特殊性。如果以上四个环节和后面的第六个环节我们做得比较成功，我们可能不必经历这第五个环节，即在革命低潮时捍卫秘密党并开展合法斗争。列宁为此进行了反对召回派和取消派的斗争。由于当时的俄国党在第三和第四个环节分裂了，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沙皇通过成立议会与资产阶级分享政权的方式渡过了1905年的革命冲击。但沙皇再也不可能像1905年以前那样统治了，不可能再像今天的特色黑帮那样主要依靠暴力统治了。这就产生出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保存秘密党，保存秘密中央和秘密党组织，保存秘密报纸，继续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为下一次革命准备力量；另一方面，要利用沙皇建立的议会开展合法工作，把沙皇进行欺骗的机构变成向沙皇进行进攻的阵地。孟什维克的主要部分变成了取消派，从右面攻击这条列宁在1905年革命以前就奠定基础的大路，要取消秘密党，变成合法的议会党。召回派不承认形势的变化，拒绝合法工作和合法宣传渠道，忽视了1905年后环境变化最重要的方面对工作的新要

求。我们还没有自己的 1905 年革命，特色黑帮没有受到革命冲击，绝不可能让步。但我们也还没有秘密党。这个环节对我们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的另一种环境中列宁道路的主要内容没有根本的变化。推荐阅读《政论家札记》（全集第 19 卷）去了解这个逻辑环节。

专制政府和资产阶级方面分裂工人和其他群众的主要手段是民族主义，特别是在帝国主义的竞争中保卫祖国。不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坚持国际主义，反对护国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形成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这构成了列宁道路的第六个逻辑环节。考茨基是非常有理论修养的护国主义者，其将马克思主义歪曲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企图最系统、最隐蔽。他将国际主义解释为各国工人阶级都有权利保卫祖国、互相反对，在战争后互相原谅即可。按照这种解释，各国无产阶级将与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疏远而与本国资产阶级接近，于是考茨基需要进一步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把资产阶级国家解释成“一般民主”的产物，而不是按照唯物史观将之理解为阶级斗争的产物。列宁论证了垄断、帝国主义、战争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变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个唯一正确的口号。今天特色黑帮也突出地使用民族主义这个工具去腐蚀、分裂工人，如果我们不旗帜鲜明地反对他们的民族主义宣传和鼓动，就无法真正启发工人去理解那个让工人爱国，即爱专制政府的黑帮，是他们直接的压迫者。推荐阅读《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选集第 2 卷）。

这六个逻辑环节，构成了列宁道路层层递进的结构：只有在思想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唯一性，才有了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政治任务，才有在组织上将政治教育的成果巩固下来的必要性。如果没有思想统一基础上的强大组织，那么无产阶级就没有力量，就谈不上争取领导权的策略。没有坚持这条秘密党去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的信心，就难以在低潮时继续这条革命的直路。而没有各国工人阶级互相接近的、各国工人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观念，国际主义会沦为空话。这种层层递进的结构产生了列宁道路的整体性：如果否定其中某个环节，那么逻辑上就会否定其它环节，一路退回合法马克思主义放弃社会主义目标的改良主义。只有坚持这种整体性，坚持列宁道路，才能促使历史沿着上升路线发展，走向第二次

社会主义革命。

为了更好地总结佳士抗争，还应该注意这样几份材料。一份是列宁的《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在里面介绍了马克思在巴黎公社起义之前将之称为蠢举，但在运动起来之后却重视群众的主动性将教育群众去做下一次斗争。佳士抗争中的斗士们也不可能取得胜利，但我们也要看到其中的主动性因素。第二份材料是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卷），以及毛泽东的《驳第三次“左”倾路线》（《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如果说列宁道路是在反对右倾中发展起来的话，那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则是在反“左”倾中发展起来的，虽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又主要是反右倾了。佳士抗争是“左”倾的政治冒险主义。为了深入剖析这次抗争的经验教训，研究王明教条主义的内容和毛泽东对之的批判，也是必不可少的。